

「吉美博物館與考古研究」演講紀實

■ 文森·勒菲弗（Vincent Lefèvre）著、賴依縵譯

吉美博物館（Musée Guimet）是法國的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。藏品近六萬件（加上 55 萬張照片），地域範圍從阿富汗到日本，時間跨度從新石器時代到現代（儘管十九世紀後的藝術品不多）。誠然，博物館保存和展示的許多文物本質上都是考古文物，但本次講座的目的則是聚焦在考古研究，即由博物館管理或共同合作的發掘和實地考察。¹

引言：博物館及其藏品簡史

吉美博物館又稱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，是在富有的里昂實業家兼宗教愛好者埃米爾·吉美（Emile Guimet, 1836-1918）堅持不懈下所創立。其在有生之年，收集了大量與歐洲、北非和亞洲宗教圖像相關的藝術品和物品。1879 年，他在里昂創立了宗教博物館，所在地是他個人出資並由儒勒·沙特龍（Jules Chatron, 1831-1884）設計的建築。十年後，鑑於當地公眾對此館缺乏興趣，吉美決定將自己的收藏遷往巴黎，捐贈給法國政府，並建造一座館舍來收藏這些藏品（圖 1）。

最終建成的建築，深受儒勒·沙特龍最初設計的影響，由查爾斯·特里爾（Charles Terrier, 1841-1900）設計，並於 1889 年 11 月 23 日開放。它採用寬廣內庭和一系列大型展覽廳的原則，並以「新希臘式」神廟為藍本。這些展廳陳列的作品根據出土地點分類，而非按等級劃分，所有展品都陳設於帶有誇張多彩龐貝風格的新古典主義裝飾環境中，這種風格一直延續到 1920 年代；現在唯一倖存的部分是裝飾

著女像柱的圖書館，已被登錄為受保護建築。

1927 年，當位於夏樂宮地區（Trocadéro）的印度支那博物館（Musée Indo-chinois）關閉時，偉大的藝術史學家、美學家菲利普·史坦（Philippe Stern, 1895-1979）將路易·德拉波特（Louis Delaporte, 1842-1925）1889 年以來攜回的大量高棉雕塑轉移至上述建築，與埃米爾·吉美的藏品相伴。博物館於 1938 年重新開放，大型室內庭院經過改造，以容納這批高棉藝術。1945 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羅浮宮將其所有的亞洲藝術藏品，特別是中國藝術藏品（6 千件瓷器），轉移到了吉美博物館，以換取埃米爾·吉美收藏中與亞洲無關的藝術作品。

博物館最初幾十年的考古研究

埃米爾·吉美本人對考古學有著濃厚的興趣。他從未親自進行挖掘，但資助了一些考古工作，尤其是在埃及安提諾埃（Antinoé）的發掘。這些發現曾在吉美博物館展出，但由於是埃及文物，後來被轉移到了羅浮宮，其中一些現在存放在法國的幾家博物館中。



圖 1 吉美博物館外貌 ©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/Vincent Leroux



圖 2 由過去博物館室內庭院改建成的高棉藝術展間 ©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Guimet/Vincent Leroux

透過田野研究獲得的藏品

在博物館成立的最初幾十年裡，就亞洲文物而言，多是透過田野調查而來到法國，只有少數是正規的考古挖掘成果。如沙畹（Edouard Chavannes, 1865-1918）或是伯希和（Paul Pelliot, 1878-1945）在中亞和敦煌的考察，其中一些文物直接捐贈給吉美博物館，而敦煌畫作則是先捐給羅浮宮。

來自中南半島（尤其是柬埔寨）的藝術品，最初是路易·德拉波特的考察成果，如前所述，在 1927 年這些藏品轉移到吉美博物館之前，先在印度支那博物館展出。自 1907 年起，法國遠東學院（Ecole française d'Extrême-Orient, EFEO）在吳哥窟進行了挖掘和修復工作。1930 年代，許多雕塑被送往吉美博物館（圖 2）。

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（DAFA）的歷程

法國在阿富汗的考古工作，是一場交織著智性、感性與文學性的罕見探索——橫跨兩國，也深植於一座博物館的靈魂之中。這百年間，見證了無數珍貴的發現，吉美博物館阿富汗展覽廳的啓用，帶來一場又一場獻給最新考古成果的展覽：包括安德烈·馬樂侯（André Malraux, 1901-1976）鏗而不捨、卻苦尋未果的「希臘紐帶」（the Greek link），貝格拉姆（Begram）空前的發現、巴米揚（Bamiyan）的重現於世；彷彿一卷陌生的民族誌、一種與人相遇時真切的悸動，以及最後深烙於心底的那片舉世罕見、壯麗非凡的景色。

在東方式現代性「正在形成」的背景下，我們必須理解阿富汗阿曼努拉國王（King Amanullah, 1892-1960）在 1922 年向法國提出創建「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」（Délégation

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, DAFA）這一舉動所代表的重大意義。當時，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催生了多個新興國家，中東與印度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覺醒——阿富汗也不例外。在貫穿整個十九世紀英國與俄羅斯「大博奕」（the Great Game）的背景下，阿富汗扮演了「緩衝國」的角色。國王選擇擺脫直到 1919 年第三次英阿戰爭結束前，一直重壓在阿富汗外交政策上的英國監管，可以從當時法國所享有的智識聲望中得到解釋——法國在開羅、伊斯坦堡和貝魯特等地的中學（lycées）因其卓越的教學吸引了當地貴族子弟就學；在國外的考古活動，特別是在鄰近的波斯地區，也展現出其學術實力。此外，阿富汗也在教育領域尋求法國的協助與專業知識。1922 年 9 月 9 日，《關於賦予法國在阿富汗考古發掘特許權的協定》（*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Concession of the Privilege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Afghanistan*）簽署，DAFA 成立。對於阿曼努拉這位擁抱當時歐洲所理解的「進步」理念的君主心中，他的目標就是透過教育和歷史逐步鞏固國族認同。

1922 年，DAFA 獲得了在阿富汗全境進行探勘和挖掘的獨家權利。該協議包括一項共享發現條款：出土文物將在兩國間分享，豐富了巴黎吉美博物館和當時正在籌建的阿富汗國家博物館的典藏；然而，黃金、白銀或形狀獨特的物品仍將歸阿富汗所有。這項分享條款一直到 1950 年代仍有效，之後經雙方同意逐漸廢止，但直到 1982 年才正式廢除。

二十世紀初，精通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歐洲學者，醉心於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於西元前三世紀在希臘化世界的邊緣、通往亞洲門戶的巴克特里亞（Bactria，譯注：古稱大夏）創建

的「千城之國」。因此，挖掘巴克特里亞勢在必行——比任何法國外交官更早抵達喀布爾的第一任 DAFA 主任阿勒弗雷德·福歇（Alfred Foucher, 1865-1952），即使本來更傾向於集中精力在「希臘式佛教」遺址似乎頗豐的首都周邊以及鄰近的卡比薩地區。由於 1924 ~ 1925 年在巴克特里亞的工作令人失望，福歇自己諷刺地稱之為「巴克特里亞海市蜃樓」。直到 2004 ~ 2008 年在巴爾赫省（Balkh）的巴ктres 的發掘，發現了一些石塊、圓柱柱身和柱頭，最終確認了希臘化時期的遺跡，儘管它們是被重複使用的。

在福歇的正式指導下，雖然實際上是由約瑟夫·哈金（Joseph Hackin, 1886-1941）在 1925 ~

1940 年間、羅曼·葛施曼（Roman Ghirshman, 1895-1979）在 1940 ~ 1942 年間主導，DAFA 於 1923 年至 1941 年發掘了著名的哈達（Hadda）、索多拉克（Shotorak）、巴米揚、豐度基斯坦（Fundukistan）和貝格拉姆等遺址。² 這些由片岩、陶土和灰泥製作的雕塑以及壁畫、象牙製品、青銅器和玻璃器，見證了西元第一個千禧年，阿富汗在佛教興起時期藝術創作、人文和知識交流的蓬勃發展。DAFA 的成果受到媒體讚揚，隨著共享發掘文物運抵法國，1925 年、1929 年和 1938 年在巴黎舉辦的展覽，成為當時吉美博物館最引以為傲的成就之一（圖 3）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因為法國阿富汗考古代表團成員約瑟夫·哈金夫婦、建築師尚·



圖 3 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領導發掘期間，貝格拉姆考古遺址的鳥瞰圖。 © DAFA

卡爾（Jean Carl, 1900-1941）、羅曼·葛施曼都投身於戴高樂將軍的「自由法國」運動，這使得田野考古工作短暫中斷。1945年由效力於同一運動的丹尼爾·施倫貝格爾（Daniel Schlumberger, 1904-1972）接替。

與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CNRS）合作的考古任務

正如吾人所見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吉美博物館正式成爲「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」。在二十世紀後半葉，它透過與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（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, CNRS）的合作，參與考古研究，CNRS 的研究團隊當時進駐在博物館內。這些團隊由主要在南亞工作的著名考古學家領銜：

- 尚·馬里—卡薩爾（Jean Marie-Casal, 1905-1977）：阿里卡梅杜和南印度巨石文化（蘇圖凱尼、本地治里，Souttoukeny、Pondicherry）以及阿富汗坎達哈省的蒙迪加克（Mundigak）。
- 尚—弗朗索瓦·賈西吉（Jean-François Jarrige, 1940-2014）：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梅赫爾格爾（Mehrgarh）。
- 羅蘭·貝森瓦爾（Roland Besenval, 1947-2014）：巴基斯坦的莫克蘭（Makran）、中亞，以及最後是新的法國駐阿富汗考古代表團（DAFA）。

近期：部分策展人個人參與的考古工作

在二十一世紀，CNRS 逐漸停止與博物館聯合組建研究團隊。吉美博物館隨後不再直接參與考古研究，但仍然透過部分館員的投入而間接參與其中，這些館員偶爾會加入由法國外交部支持的考古隊：

- 戴浩石（Jean-Paul Desroches）在蒙古國的戈爾莫德（Gol Mod，匈奴墓葬遺址）。

- 文森·勒菲弗（Vincent Lefèvre）在孟加拉國的摩訶斯坦葛哈（Mahasthangarh，西元前四世紀～西元十四世紀的城市遺址）。以下後記，爲其任職吉美博物館期間，踵繼該館與考古發掘工作密切配合的初衷，所參與的工作成果概述。

後記：摩訶斯坦葛哈的挖掘工作記錄

摩訶斯坦葛哈位於孟加拉國，約於西元前四世紀建立，持續有人居住到至少西元十四世紀，部分地區甚至更晚。曾是印度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，大致標誌著其東部邊界。過去被稱爲蓬德拉那加拉（Pundranagara），是孟加拉北部奔那伐彈那（Pundravardhana）省首府。真正的挖掘工作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。自 1993 年以來，一個法國、孟加拉聯合團隊每年進行一次考察，對該遺址進行系統性的探索。³

一、摩訶斯坦葛哈簡介

1947 年，孟加拉被一分爲二，東部歸巴基斯坦，西部歸印度——其後於 1971 年獨立成爲孟加拉國。然而，從歷史和考古的角度，孟加拉在地理和文化上爲一個整體，二十世紀劃定的邊界在此並無太大意義。摩訶斯坦葛哈（Mahasthangarh，梵文字意爲「巨大的防禦之地」）坐落在孟加拉西北部的拉傑沙希（Rajshahi）區，博格拉（Bogra）鎮以北幾公里處（圖 4）。雖然幾個世紀以來，可以在孟加拉境內劃分出若干歷史區域，但北部如今是被劃入印度邊界的區域之一。南臨恆河（the Ganges），東接布拉馬普特拉河（the Brahmaputra），該省曾被稱爲奔那伐彈那，而當時被稱爲蓬德拉那加拉的摩訶斯坦葛哈，即使不是首都，至少也是其主要城市。但在這個三角洲地區（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），幾個世紀以來環境發生了變化，河流的



圖 4 摩訶斯坦葛哈的東北城門 © Mission française de coopération archéologique au Bangladesh

流向發生了巨大的改變，而孟加拉灣最初的海岸線肯定比今天更深入內陸。

換句話說，摩訶斯坦葛哈過去的地理位置比今天更具戰略意義。事實上，該遺址東鄰戈羅多亞（Karatoya）河，如今，這條河只不過是條蜿蜒細流，但是文獻記載和環境研究都證明，它曾經是一條主要的水道。戈羅多亞河當時是奔那伐彈那的東界，最初是印度世界與東南亞之間的邊界。摩訶斯坦葛哈從巴林德（Barind）沖積階地的東緣俯瞰著這條河流，因此控制著一條從喜馬拉雅山區延伸到印度洋的水路樞紐。

面積約 7 千 7 百平方公里，並有多條河流穿過的巴林德階地（梵語為 Varendra）其中戈羅多亞河是最東邊的一條，位居孟加拉盆地要衝。它的海拔不高，但在像孟加拉這樣平坦的地區，

足以將摩訶斯坦葛哈遺址轉變成一種衛城，過去水量必定更加豐沛、部分或完整環繞城堡的護城河自城下流過時，一定更加氣勢磅礴。

即使在今天，景觀中最顯著的特徵仍然是環繞整個城池的城牆遺跡；如今，只剩下幾層燒製的磚塊，但完整時，它一定非常壯觀，尤其是在河流一側地勢最高、最陡峭的部分。城牆呈不規則長方形，南北長 1.5 公里，東西寬 1 公里。城牆有幾個城門，但很難確定它們是否都是原有的。無論如何，圍起來的區域相當廣闊，如今有三個村莊散落在耕地間。在小鎮東部，還保留著一些不同時期的遺跡，也是用燒磚建造的：包括印度教寺廟、一座宮殿式住宅、清真寺等。另一方面，西部乍看之下，似乎不見任何古蹟。

然而，摩訶斯坦葛哈並不局限於城堡本身，由於缺乏適當的挖掘以及不幸的頻繁盜掘，周邊地區遍布著或多或少可被視為考古遺跡的土堆。然而，仍然有一些印度教寺廟，例如位於城鎮東北部，俯瞰河流的戈文達比塔（Govinda Bhita）神廟，以及幾座佛教寺院。事實上，根據寺規，寺院必須建在遠離城鎮，但又不能離得太遠的地方，以便僧侶化緣。

二、過去的發掘

摩訶斯坦葛哈似乎至少在十四世紀左右，回教在此地生根時已被部分或全部遺棄了。十九世紀初英國旅行家曾多次提及此遺址，但直到印度考古學之父亞歷山大·康寧漢爵士（Sir Alexander Cunningham, 1814-1893）根據七世紀中國西行求法僧玄奘（602-664）的記載，才將其辨識為古代的蓬德拉那加拉。儘管康寧

漢爵士並未實際挖掘這個當時大部分被叢林覆蓋的遺址，但他仍繪製該地及其周邊地區的第一張考古地圖。真正的發掘工作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，迭經印度考古調查局（K.N. Dikshit, 1889-1946）、東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考古部門（Nazimuddin Ahmed, 1923-2009）主導。

鑒於該遺址的規模，這些挖掘只是局部的；其中一些發掘工作進行得非常出色，出版的書籍雖然不夠全面，但仍然包含豐富的資訊。遺憾的是，孟加拉團隊的許多調查成果尚未出版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法國與孟加拉的合作應運而生，這主要歸功於法方尚·弗朗索瓦·薩勒（Jean-François Salles, 1944-2023）的推動。這項新合作背後的理念不僅是進行聯合發掘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讓我們的孟加拉同僚能學習到更多現代考古技術。



圖 5 摩訶斯坦葛哈東南區域的發掘 © Mission française de coopération archéologique au Bangladesh

三、法國—孟加拉聯合考古的里程碑

撇開（基本的）訓練不談，合作案最初有雙重目標：建立遺址首次的完整地層學，並試圖了解其城市組織。一旦確定了這些，就可以根據團隊可運用的資源，選擇成果可期、又實際可行的區段進行挖掘。

1993年至1999年，第一階段探勘工作集中在城堡的東北象限一個1,500平方公尺的區域，毗鄰東側城牆。在摩訶斯坦葛哈考古史上，這還是首次觸及6至7公尺深度的原生土壤，並藉由幾項碳14年代測定，得以建立從西元前四世紀末到西元十八世紀的地層學參照。其中，可以區分出兩個特別重要的時期，第一段是從西元前三世紀延續到西元三世紀，第二段則是從西元六世紀延伸至十二世紀。除了不同時期相關的豐富陶器組合外，考古隊還發現了硬幣、玻璃、半寶石珠、紅陶珠、銅鏡、銅燈以及模製的紅陶板。這些發掘工作促成了兩部書籍問世，分別為法文版與英文版。

基於此項成功經驗，從2001年到2011年考古隊將工作地點轉移到城內的東南角，一個被稱為馬扎爾（Mazar）的區域，這是因為該處有一座鄰近傳聞是回教征服者墓地而造的清真寺。最初的目標是挖掘城牆內的臺地，並尋找笈多時代（Gupta period，西元四～六世紀）的遺跡，這是「東側城牆」的發掘所缺乏的時期。

然而，由於技術上的考量以及在清真寺附近挖掘的困難，最終決定探索臺地的南坡。這次大規模的發掘出土了孔雀王朝（Maurya Empire，西元前四～二世紀）的一座宏偉門樓，以及帕拉—賽納時期（Pala-Sena period，西元八～十二世紀）一條通往城市的美麗道路。出土文物包括大量的武器，帶有孔雀藍釉的中世紀陶片和中國青瓷瓶殘片的陶瓷器，以及印度

教太陽神（Surya）的玄武岩雕像。

這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目前正在出版中，印證並闡明了「東側城牆」發掘工作所支持的年代順序。此外，加上城牆西北角的探坑試掘（城門遺址？）以及孟加拉考古學家對西南門（銅門）進行的發掘工作，現在可以肯定的是，儘管進行了多次重建（特別是因戈羅多亞河造成多次洪水使然），但城牆的布局仍然是原初的，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至三世紀。這意味著摩訶斯坦葛哈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據點，位於一個此前無人居住的地區（由於當時海水在孟加拉這片區域相對地較晚退去）。儘管沒有書面證據證實，但是很難想像孔雀王朝之外，還有什麼政權能促成這樣的聚落。這座城市在其早期的歷史時期（西元前三世紀～西元十三世紀）和帕拉王朝（八～十二世紀）時代最為繁榮。

2012～2013年因法國考古隊的轉型，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。隨著年代序列確立，我們思考重新研究城市組織，因此開始探索遺址東部區域的南北軸線。為此，我們選擇了一個連接東北門（長久可見）和東南門（在發掘馬扎爾期間發現）軸線上，介於前述「東側城牆」區域和當地稱為拜拉吉爾·比塔（Bairagir Bhita）寺廟遺跡（東南區）間可供挖掘的土地。這些持續到2022年的挖掘工作，發現了一些居住區，目前仍在對發掘成果進行分析（圖5）。

四、新方法

在摩訶斯坦葛哈的調查工作凸顯了一個重大問題，就是西半部的「空白」：是現實如此？還是遺跡尚未發現？一些有限的探坑傾向於第二種假設。但事實是，考古隊現在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：以每年5至6週、約30名工人的挖掘速度（這是經費允許的規模），需要數十年的時間（甚至更長），才能對整個遺址進行系



圖 6 摩訶斯坦葛哈的數位地表模型 © Mission française de coopération archéologique au Bangladesh

統性地地的發掘（這也同時產生在私有地和耕地能否挖掘的問題）。傳統方法已不能滿足需要，且必須將其運用在確定有潛力的區域。為此，已採用了各種地球物理探勘工具，但迄今為止，結果參差不齊。儘管如此，考古隊最近著手使

用無人機對摩訶斯坦葛哈及周邊地區進行完整的空拍，並製作數位地表模型（Digital Surface Model, DSM）。這種方法與地面探勘結合，不僅旨在辨識值得進行考古發掘的區域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記錄人類居住的密度並更新考古地圖。這項工作相當必要與緊迫，因為如上所述，城牆內，與尤其是城牆外的許多小型遺址，因盜掘或僅僅是人類對土地的開發而消失（圖 6）。

與此同時，考古隊正在重新啓動對該遺址的自然環境研究。1990 年代，對古生態環境的開創性研究已揭示了戈羅多亞河的演變。得益於歐洲的資助（「正法計畫」〔DHARMA project〕：即補助編號 809994：〈「印度教」苦修主義的馴化與南亞和東南亞的宗教形成〉〔the Domestication of 'Hindu' Aceticism and the Religious Making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〕，由歐洲研究委員會〔the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Horizon 2020〕計畫資助），過去兩年一直在進行一項新的地形學研究計畫。該計畫旨在深化二十多年前取得的成績，將透過具體說明河川變化的時間序列來完善這些成果，並更好地闡明環境與人類活動之間的交互作用。

文森·勒菲弗（Vincent Lefèvre）為巴黎索邦大學南亞及東南亞考古及藝術史學教授、吉美博物館前典藏與策展事務主任
賴依縵任職於本院展示服務處

註釋：

1. 本院於 2023 年 11 月舉辦「無界之涯——從海出發探索十六世紀東西文化交流」特展，展出多件法國吉美博物館的珍貴藏品。2024 年初，時任該館典藏與策展事務主任文森·勒菲弗博士來臺收展，並應邀舉辦講座。
2. 譯注：貝格拉姆應為貴霜帝國（Kushan Empire，西元一世紀到四世紀）夏都，即《大唐西域記》所記載的迦畢試國所在，見（唐）玄奘、辨機原著，季羨林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），頁 135-137。另請參魯保羅（Roux, Jean-Paul）著，耿昇譯，《西域文明史》（北京：中國藏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 123-124。
3. 譯注：Pundravardhana 中文譯名「奔那伐彈那」，出自《大唐西域記》，請參（唐）玄奘、辨機原著，季羨林校注，《大唐西域記校注》，頁 790-792。《新唐書》地理志做「奔那伐檀那」，請參（宋）歐陽修，宋祁撰，楊家駱主編，《新唐書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1），頁 1152。



織造精彩

清宮緞絲刺繡展

Weaving Brilliance

Tapestry and Embroidery from the Qing Court

2025/4/19 — 7/6

陳列室 Galleries 202 210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100⁺院慶
THE 100⁺ ANNIVERSARY OF THE
NATIONAL PALACE MUSEUM